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By Wang Gungwu.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ix, 354pp. Notes, Glossary, Index. HK\$195.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五篇論文，研究焦點為唐宋歷史；第二部分五篇論文則集中討論中國人對文化的態度，包括怎樣去認識歷史、社會權利與義務以及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等問題。第三部分的五篇論文把方向轉移到現代。作者發現今日中國很多人被他們的過往歷史所吸引，而他們的最近經歷，又和他們的古老傳統那樣，構成他們的中國特色的核心。

以上論文在收入本書前都曾發表過。最早一篇是討論十世紀時史書編纂的《舊五代史和五代時期之史著》，發表於1957年。最近的一篇《中國革命之外》，刊於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3期(1990年1月)，原為作者應普林斯頓大學 Walter E. Edge 講座邀請，於1989年5月15日演講之講詞，時距胡耀邦之死不過一個月，未幾即發生天安門慘劇。兩文發表時間前後相距超過三十年。這些論文揭示了作者在其學術生涯的不同階段中，在探索和研究中國問題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成績。全部論文都保留原貌，不加修改，反映出過去三十年間作者在探究中國人怎樣看中國的今昔這專題上前後不同的觀感。

作者在導論中開宗明義對中國特性作這樣的界定：「這種特性是活的，也是可以改變的，是一種共有的歷史經驗產物，經驗的紀錄不斷影響特性的發展，對中國人來說，已日益自覺到特性的存在；而在非中國人眼中，特性與那些顯得是中國的，或是屬於過中國的有關。」(頁2)接着這脈絡，作者提出如下問題：最早期的中國人怎樣自覺到他們是中國人？中國特性的意念多個世紀以來是怎麼樣改變的？這意念在今日還有多大的相關意義？這自我形象怎樣和其他人眼中中國的形象作比較？事實上，全書(特別是第二、三兩部分)就是圍繞着上述問題引申討論的。

第一部分前兩篇論文都是討論史書編纂問題的。第一篇論文《對後期正史的一些評論》，就唐代以降九種正史的內容和體裁加以比較，分析它們的編纂經過。作者指出，儘管這些正史的形式和資料編排變化不大，但卻反映出歷史作用和史學思想以及政治和哲學意識的變化；即使對同一事件，兩批史學家也會表現出不同的史識，如《新唐書》、《舊唐書》和《新五代史》、《舊五代史》那樣。這些正史所反映的歷史變化，可從不同歷史時期所抽取的幾個基本概念之不同變換和組合中顯示出來。這篇論文提綱挈領，要言不煩，頗便初學。第三篇論文《馮道》從新的角度重估馮道其人。宋代兩大史學家歐陽修和司馬光都以馮道為衰世的象徵，以其歷事五朝，恬不知恥而痛加申斥。但是，和馮道同期的人卻對他極為尊敬，視之為醇儒、謙謙君子和大臣典範。作者指出馮道及其時人所持「忠」的概念，與百年後宋代史學家所持的不同。公元923年以降，華北被沙陀和河北同盟控制；926—960年間來自此同盟的十二位君主相繼嗣位，其持續性令人驚嘆。十二人中，三人是嫡

子、二人是養子、一人是姪兒，另一人是女婿。其餘五人之中，唐莊宗是同盟原先領袖的兒子；另四人則為因襲河北傳統篡權的統帥。馮道所事的十一位君主中，十人出自同一沙陀——河北的同盟組織；另一人是契丹君主，也與沙陀傳統有聯繫。勾除掉儒家的歪曲，馮道及其時人不過是一羣任職於一個掌握了中國部分控制權的組織的官員，儒家忠君愛國的概念並不適用於他們。他們甚至樂於見重於他們的君主，從未想過不忠這回事。馮道的悲劇性在於他不了解他正活於一過渡時代，社會、政治和哲學觀念的重要變化即將發生。他不了解他那個時代的儒家學說，在他死後百年間，將被一種更嚴苛而有力的信條所取代。他也料不到他的忠誠會受到日後的正統觀念的裁決。十一世紀那些一心要復興儒學傳統的人，對馮道修養之淺陋薄弱，毫不寬容。馮氏的貢獻既不被後人重視，於是成為價值轉變的犧牲品。這篇論文出版逾三十年，仍經得起時間考驗，迄今還是這方面不可或替、充實而有光輝之作。

接着兩篇論文分別是《長江中游在唐代政治之地位》及《小國的辭令》。在前文中，作者從地緣政治學角度，深入探討從三國到宋、金一千年間，華中作為可影響全國統一的因素。後文則探討北宋政權如何以古為鑑，處理它所面對的問題。長江中游指以中江為中心，包括其支流漢水及洞庭湖附近的地區，涵蓋今湖北、湖南兩省的大部分。這地區提供另一路綫到長安和洛陽，它也是長江上游四川的前哨。有唐一代，長江中游的重要性取決於其戰略地位。直到黃巢起事時，長江中游的湖南、鄂岳、山南東和荆南四處，因行政上的分隔，支援它們的經濟資源有限，又遠離權力中心，是當日最為分裂的地區。中央不難控制它們，即使運河受阻，長江下游的財富仍可經此區轉輸中央。可是，從公元 876 到 886 十年間，中央逐步失去對長江中游的控制，唐室無論在關中或四川，都陷於貧困、孤立，終而無可救藥的地步。作者指出唐末五代之間，由軍人支配的較大行政單位——道，退讓於以文人執政的州。這些州都是由立意集權中央的軍人所興復、支持。每位角逐者在有意無意之間、都縮減節度使的權力。長江中游並非凝聚力量的中心；反之，在外面的權力中心壓逼之下，加上行政單位四分五裂，轄地越來越小，地區性規模較小的統一權力中心遂脫穎而出。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指出唐末五代一方面是獨立而強有力的地方割據，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忽視集權統一力量的存在。過去我們對五代的認識，實在失之膚淺。

在《小國的辭令》一文中，作者把唐帝國的辭令廣泛地分為五組：主要是道德和宇宙論的，表示無所不包；特定用於朝貢的；貶損的言辭，是為使用武力而申辯的；估算相對的強弱，強調現實和靈活彈性的；契約關係的。無所不包和用於規範朝貢國家等級制度的辭令，只適用於國力鼎盛時。直至 979 年，北宋帝皇把辭令和現實同等看待，面對邊境的領土糾紛，認為如有必要，不惜一戰。後來，形勢出現新的變化，他們不得不承認，辭令不能反映現實，甚至和現實相互抵觸。1005 年或稍前，他們已願意修改辭令內一些較為浮誇的主張。1005 年，澶淵之盟締結，宋遼關係是近代以前中國歷史上最為接近於對等的。此後，當北宋帝皇熟思中國歷史的持續性時，官員則注意到分開處理現實的體面傳

統，從而不需改變辭令。宋代承襲唐代最安全而成功的取徑是「羈縻」和「懷柔」政策。作者從《冊府元龜·外臣部》的《序》中得到啟示，憑過人的洞識力和歷史想像力，提出新見，詳人之所略，這是本文獨特之處。

第二部分首篇論文《文化起源：中國學術的過渡時期》，是從史學史角度討論本世紀初，成長中的民族意識如何引致中國史學家重新查驗文化起源，從傳統研究方法轉移到近代研究方法的情形。文中尤其注意進化理論在這過渡時期對少數「民族主義」學者的衝擊。接着一篇《中國文化與文化傳播》，大體上是前篇論文的引申推衍。本世紀初，西方學者對傳播與進化問題的看法大相逕庭；而對中國人來說，進化理論遠比傳播理論更具吸引力。民族主義的強化令中國人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感興趣，以至年輕學人與國外之學術聯繫，都是抗拒「文化傳播」意念輸入中國的主因。當兩種不相等的文化碰頭時，傳播發生，劣的文化汲取優的文化，或優勢文化的不良成分移植到劣勢文化，取代其精華部分。對中國人來說，傳播日益顯得帶有否定和難以接受的涵義。這篇論文寫得引人入勝。《中國開化之迫切要求：對變易之反省》是接着以上兩篇論文而講的。《中國歷史上的權力、權利和義務》一文從歷史途徑探討這問題。作者關注的是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權利怎樣和義務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又怎樣和權力相聯繫。作者認為中國古人是否只懂義務而不懂權利的意義這一說法，不僅是語意學的，更是值得我們據現代發展來重新查驗的問題。這問題與現代政治、法律、公民權和人權如何引進中國，怎樣影響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有相關意義。作者斷言中國歷史上，反對各種權利而偏愛義務的權力已行使了大約二千年；過去六十年來，中國人試圖利用新的權力來保證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平衡。他們還沒有成功，但可能有辦法找到出路。

第三部分《今日中國今昔並列》一文，從中國大陸歷史的編寫來重新解釋歷史事件，並闡明中國人對過去和古為今用的感受。《五四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之補救》、《中國革命之外》和《中國知識分子》三文性質相近，故一起介紹。作者發人深省地指出：「時光短暫，補救的萬應藥當然是無法抗拒；不過從文化革命的補救經驗來說，更大的危險也許是勸止自由和科學思想的神話和歷史標語口號。當中國人正要猛批文化大革命時，也要責難五四，或者不是壞主意。」（頁 244）儘管 1916 到 1927 年間在近乎無政府的情況下出現多種選擇，「五四」一代雖然成功地控制了青年，卻為未來二十年間，使國家陷於兩極的、非此即彼的簡單化對立準備條件，從而使中國的抉擇劇減。中國革命的大諷刺之一是文化價值在不同時期基於它是中國的，因而只能以中國的、而非以外來的標準去裁決的理由受保護。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就是在亂成一團糟之下，無人知道誰仍是革命家。儘管中國滿口革命辭令，但它的改變還是不夠。至於居於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華人，則不受傳統的政治和社會規範影響。他們在革命之外的生活使他們徹底認識入籍國家的所作所為，不論是經過革命的，抑未經革命的。作者所說革命之外，是指在中國國外和在中國人想象的革命意念之外，別處華裔所取得的成就對中國國內人民有所衝擊。他認為「革命之

外」，如要有任何持久的影響，並最終改造中國，則中國必須持續不變的向世界開放。今日的啟示是：「對世界開放，那你喜歡要中國怎樣，便任你怎樣。」(頁 260)他斷言儘管中國大陸強調它新的、無所不包的想像，當形勢改變，知識分子承襲的遺產再受尊敬時，中國知識分子便可有效地運用過去的方法，為他們的原則而奮鬥，甚而捍衛他們現在的角色。這三篇論文出版於 1979 - 1990 年十年內，就這十年乃至今日的事態發展看來，作者所言，雖未足成爲定論，但部分珠璣之論，並不見得是明日黃花。

這部分的另一篇論文對毛澤東的成敗作評估，尤其注意他思想行爲中的中國和馬列成分的比重。作者指出毛澤東較諸時人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從不浪費時間爲他的中國身分及中國文化的衰落而操心。他因不受這些上流社會的感受的影響，遂能一心一意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帶給中國人民，並視之爲理所當然。1930 年代毛作爲全國知名的人物，他的愛國心和對農村社會正義的關切爲人所欽佩；對他來說，這是顯示中國人不但了解馬列主義，而且還能把馬列主義置於中國背景之下的最好時機。1949 年後，毛盡力擺脫抗戰期間適合他作爲統一戰綫領導人所需的傳統價值。社會主義階段登場，民族主義階段下馬；作爲支配意識型態的儒家思想則爲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所取代。1960 年中蘇分裂，毛揚棄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轉過身來，向本國固有資源求助。毛對馬列主義科學真理的實行滿懷信心，他確信他知道甚麼是中國人民不會或不能做的。他因對治下人民要求過高而終致妨礙國家進步。毛的思想行爲雖然還是中國的，但到去世前，在他心裏，他也是堅定的馬列主義者。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和中國及馬列主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作爲中國人，毛的一項重要成就是：他的新中國確實對世界有重大影響。

書中印刷錯誤或遺漏有好幾處，謹就所見列示如後：

頁 59，行 25，註 68 爲 63 之誤。

頁 230，漏註 1。

頁 279，行 11，It was still a joke……，應更正作 It was still……。

頁 299，註 7，*Chung-hsing kuan-ko shu-mu chi-kao*，頁 340，辭彙表作中興館閣書目，按該書全名爲中興館閣書目輯考。

頁 307，最末一行 Lu Yuan-yin in 810，應是 Lu Yuan-ying 之誤。

頁 309，註 52，(*Chu Wen-kung chiao Ch'ang-li hsien-sheng wen-chi*)，辭彙表漏列，應列出爲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Tseng-kuang chu-shih yin-pien Tang Liu hsien-sheng chi*)，頁 350，辭彙表作增廣唐柳先生集，應作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較妥。

頁 323，註 11，*Nan-ch'iao Hui-Lu*，應改爲 *Nan-ch'iao hui-i lu*。參照辭彙表(頁 346)。

頁 331，ch. 11，漏註 48。

頁 344，辭彙表 *Li-shih chen hsien t'i-tao t'ung-chien* 歷山真仙體道通鑑，應更正作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頁 345，辭彙表，Lu Hsien-hsiu 呂咸林，應更正作呂咸休。

此外，作者在頁 135 指出 Grafton Elliot Smith 所說：「在歷史時期，據說中國人口數目加倍，每 250 年至少有一次。」全與史實不符。作者認為所有史料都顯示從公元一到十四世紀，中國人口驚人地固定不變，這 1,500 年間的人口約為四到五千萬人。Smith 所說固然錯誤，作者所言也不盡切合事實。就人口增長的總趨勢來看，這 1,500 年當然遠較明清時期緩慢，不過也有三次高峯出現：西漢末近六千萬，唐天寶極盛期近億，北宋末一億以上。即使到明初，全國人口估計超過 6,500 萬。

書中論文如能加子題，則章節更為清楚，更便於讀者。

為本書撰寫書評並非易事。本書所收論文涵蓋古今，性質不一。一些論文是堅實力作，一些則注重概念發揮；而另一些只是初步研究，有待深入的探討。作者生於海外，在外國受教育，他的一些觀點和看法，我們不盡贊同。惟本書指引出很多尚待開採發掘的寶藏，啟迪了新的研究路向，深化我們對貫注於歷史之中的中國文化的認識，這是本書的最大貢獻。作者在《近代中國傳記》一文中，提到欲撰寫陳嘉庚和陳伯達傳記而未果，我們希望他在事務繁重之餘，賈其餘勇，完成未竟之業。本書勝義紛陳，文字雋永猶其餘事。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